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AMI) 集刊核心

PEKING UNIVERSITY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北大政治学评论

(第 17 辑)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主办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政治学评论. 第17辑 / 燕继荣主编.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24. — ISBN 978-7-100-24411-4
I. D0-53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4YV8220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北大政治学评论

(第17辑)

燕继荣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24411-4

2024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2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0%

定价: 118.00元

目 录

特稿

- 李宝荣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多人才保障：基于公共管理学科的视角 3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

- 张允起 中国政治文明的起源及其原初形态再探讨 13
- 胡 斌 “由事绪理”与“即事论情”：
关于宋代法律案件的“事情结构” 35
- 凌 鹏 佟 萌 论传统社会中的“田土细事”及其背后的人之形象：
以清代咸丰朝巴县档案为史料 55
- 田 耕 “县”的观察与建设：重返李景汉的“定县调查”，1928—1944 82
- 王利平 边界与中间：一个观察现代中国国家进程的视角 113

国家治理

- 白智立 刘梦远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
公务员制度与干部制度的关系研究 135
- 王兵艳 张开平 王 彤 地方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实证研究 157

西方政治思想

- 陈 丽 刘训练 古罗马反僭政视域下的恺撒的仁慈 179
- 王晶晶 获取与扩张：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 199
- 李海默 柏克论“君主之镜鉴” 216

比较政治

- 胡淑佳 周建勇 意大利“不稳定”内阁的制度探因：
基于第二共和以来的考察 245
- 李牧今 回归唯物史观的性别平等问题 270
- 霍伟岸 反对党与爱国君主的悖论：博林布鲁克政党观新探 285

附录

- 《北大政治学评论》约稿函 309
- 《北大政治学评论》稿件规范 310

获取与扩张：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

王晶晶*

摘要：新君主是《君主论》一书的主要进献对象，也是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中最具争议性的形象。对新君主的理解不应局限为特定理想类型的人格化统治者。这一形象所蕴含的对于政治野心的鼓动、对于获取和扩张的强调揭示了一种新的统治方式，这是所有的君主国和共和国都应当采取的策略。这种对于新君主的解释一方面平衡了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的双重面向，另一方面也并未抹杀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差异。在对外扩张中，共和国能够容纳贵族和人民这两种对立的脾性，这使得富有德行的军事将领能够不断地涌现出来，避免了君主制下的继承困境。

关键词：获取；扩张；新君主；共和国；马基雅维利

Abstract: The *Il Principe* is mainly contributed to the new prince, who is also the most controversial character in Machiavelli's political theory. We should not take the new prince as a idea type of personified ruler. This character, which encourages the political ambition and emphasis on acquisition and expansion, reveals a new way of governance. That is the strategy that all principalities and republics should adopt. T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prince balances the dual facets of Machiavelli's political theory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does not eras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publics and principalities. In the external expansion, the republics are able to accommodate the opposing humors of the people and the greats, which enables the virtuous captains to constantly emerge, and avoid the inheritance dilemma under the principalities.

* 王晶晶,政治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Key words: Acquisition, Expansion, New prince, Republic, Machiavelli

一、引言

1513年12月10日,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寄给友人弗朗切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的信中提到自己在撰写一本“探讨君主国是什么,它们有哪些类型、如何获得、如何维持以及为何丧失”^①的书。马基雅维利宣称,这本凝结了他数十年来对政治问题思考的小册子值得受到君主尤其是新君主的青睐。的确,新君主是《君主论》的核心教导对象,书中最为人们乐道、令人震撼的“授恶学说”几乎都是马基雅维利赠送给新君主的“最宝贵”的礼物。与世袭君主相对,新君主须凭借自己的德行或运气来维持统治,而前者只要依循传统、习惯和血缘就能稳固统治。新君主的概念并不复杂,但是这一角色身上背负的非道德特质引发了持久的争论。马基雅维利塑造新君主这一角色的真实意图为何?新君主是否只是一位人格化的统治者?围绕新君主展开的“授恶学说”与《李维史论》中的共和主义关切是否构成了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的断裂?

长久以来,强调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立场的研究者或是将《君主论》视作绝对君主制的讽刺作品,或是将其归类为马基雅维利共和主义转向前的阶段性思考。^②在这两种解释中,新君主的重要性都或多或少被弱化了。晚近的研究者试

① [意]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全集》第6卷书信集(下),段保良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511页。

②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Baron, Hans, *In Search of Florentine Civic Humanism: Essays on 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Thought*, Vol. 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Baron, Hans,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Civic Humanism and Republican Liberty in an Age of Classicism and Tyranny*, Vol. 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玛丽·G. 迪茨(Mary G. Dietz)认为卢梭的解释存在一个问题,即没有证据表明,马基雅维利在写作《君主论》时预想的读者是共和主义的拥护者。迪茨改进了这种共和主义解读,将《君主论》视作政治欺诈作品,其意图在于诱捕并颠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从而恢复共和主义制度。但是,马基雅维利在写作《君主论》时并没有将他的读者限定为小洛伦佐(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他在行文中常常一般性地对新君主进言。迪茨的这种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君主论》的理论价值。正如皮特·布雷纳(Peter Breiner)所批评的那样,迪茨的阐释有时太过流于字面意义了。参见Dietz, Mary G., "Trapping the Prince: Machiavelli and the Politics of Decep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3, 1986; Breiner, Peter, "Machiavelli's 'New Prince' and the Primordial Moment of Acquisition," *Political Theory*, Vol. 36, No. 1, 2008。

图重新解释新君主的形象，并挖掘其理论意涵。左派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创造性地将新君主从具体的、人格化的统治者角色中解放出来，认为他代表着一个纯理论的抽象和象征，其在现代是作为政党存在的“有机体”。^① 谢尔顿·S. 沃林（Sheldon S. Wolin）也强调，新君主是政治的流变性、短暂性和无休止前进的特征的象征，作为“奠基者”的新君主，其重建秩序的工作是迈向共和主义道路的第一步。^② 沃林等学者的研究在严肃对待新君主的基础上探讨了马基雅维利的绝对君主面向与共和主义面向间的融贯性。那么，这种融贯性是如何实现的呢？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在讨论现代国家的特征时给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回答：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所有国家都是有待获取的。“获取”的特征赋予国家一种“无偏私性”，它是马基雅维利给予包括君主国和共和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普遍建议。^③ 艾丽萨·M. 阿迪托（Alissa M. Ardito）进一步地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指出，面临政治和军事威胁，16世纪的城市共和国难以为继。马基雅维利试图在托斯卡纳地区建立一个民众性领土国家（popular territorial state）。《君主论》和《李维史论》可被视作这一方案的两个相互衔接的环节。前者呼吁一位具有获取欲望的君主建立领土国家，后者试图将民众参与纳入幅员辽阔的共和国中。^④

沃林和曼斯菲尔德等学者的研究为我们理解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提供了重要启发。新君主与其说是一位具体的人格化的绝对统治者，毋宁说是特定统治方式的符号化表达。新君主统治的核心在于其获取和扩张能力的释放，这是君主国和共和国都必须具备的德行。不过，这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需要得到更为充分的文本支持。^⑤ 有鉴于此，本文回到马基雅维利的文本，更为系统地分析、论证

①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② Wolin, Sheldon S., *Political and Vision—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80, 207–208.

③ [美]哈维·曼斯菲尔德：《论现代国家的非人格化：对马基雅维利“国家”概念的评论》，谢惠媛译，《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3期。

④ Ardito, Alissa M., *Machiavelli and the Modern State: The Prince, the Discourses on Livy, and the Extended Territorial Republ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5–9.

⑤ 阿迪托的研究在早期领土国家建构的视角下系统分析了从君主国到共和国的过渡。不过阿迪托的研究过于倚重现实政治背景的分析，相关论点的文本证据仍有待进一步地澄清。参见 Najemy, John M., “Machiavelli and the Modern State: The Prince, the Discourses on Livy, and the Extended Territorial Republic,”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69, No. 1, 2016.

新君主代表的统治方式是如何延伸、拓展到世袭君主国和共和国中的。进一步地,本文强调,将新君主所代表的统治方式延伸到共和国中,这种阐释并未抹平政体间的差异。从是否能容纳贵族和民众这两种对立的脾性这一问题入手,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共和国相较于君主国的制度优势。最后,本文指出,这种对于新君主的解读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平衡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对立的双重面向,也能帮助我们反思马基雅维利共和主义理论与传统共和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

二、新君主的匮乏与获取

任何一位《君主论》的读者都能感受到文本中充斥的“你应该”“你必须”这样的表达所传达出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源自新君主面临的险峻境况。新君主的统治缺乏制度和习俗的支持,这种匮乏反过来意味着新君主需要依靠自身树立政治权威和秩序。在《君主论》中,新君主常被马基雅维利称作“奠基者”(fondatore)和“革新者”(innovatori)。然而,“再也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①。这些不确定性和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外部的作为竞争对手的其他统治者;内部的作为新制度敌视者的贵族和半信半疑的民众。面对伴随匮乏而来的挑战和危险,新君主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获取行动树立权威和秩序。

新君主的匮乏首先体现为缺乏传统制度和习俗的支持。这种匮乏最直接地体现在新君主与世袭君主的差异上。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依据统治权力获取方式的差异将君主国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世袭君主依靠血缘和继承而获得统治权。在世袭君主国中,特定家族在其历史悠久的统治中形成了一套既定的制度和习俗。这些制度和习俗以其封闭性和稳定性构成了世袭君主统治的护城河。首先,它们长久以来规范了君主的统治方式,这使得世袭君主无须制定推行新的制度,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臣民的爱戴;其次,由于世袭统治历经久远,湮灭了古老的革新记忆和原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激发民众革命的条件。也基于此,马基雅维利称,世袭君主鲜有得罪臣民的原因和必要性,他只要按照既定的

^①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22页。

制度行事，就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与世袭君主统治的确定性相对应的是新君主所面临的动荡与危险。^① 世袭君主国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使得世袭君主无须特别的努力就能维持自身的统治。理想的新君主则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合适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建立起政治秩序和权威。全新的君主国与世袭君主国或混合君主国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不像后两者那样具有既定的、可供依赖的统治和制度。这也意味着，新君主需要完全依靠自己来应对推行新制度的困难。新制度的推行充满危险，它一方面会侵害旧制度下得利的人，另一方面又难以立刻给予新制度的支持者以充分的回报。如果说习俗在长久的统治中掩藏了催生动乱的因素的话，那么新制度的推行则激起了革命的动机。可以说，在新君主国建立之前，未来的新君主和他潜在的臣民之间处于一种前政治状态，他必须从一无所有中创生秩序和权威。

新君主面临的匮乏不仅体现在缺乏传统制度和习俗的支持这一层面。这实质上是任何奠基者和革新者都可能面临的困境。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理论层面诉诸古典智慧的道路也被阻断了。这一点与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中明确的现实主义转向密切相关。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明示其对古典和基督教作家的不满。他指责这些作家描绘的都是想象中的共和国或君主国，认为他们关注的是“人应该怎样生活”，而非“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而两种生活之间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②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镜鉴的传统体裁下塑造了一位“新君主”的理想类型。这一形象颠覆了古典作家和基督教思想家对于理想君主的道德教导。此前，不管是在自然正当还是在神圣意志的秩序下，由一个终极善所指引的存在之链为政治现象和政治行动超验地确立了原则、模式和意义。马基雅维利对这一传统的拒斥使得新君主置身于一个不稳定的政治空间。在其中，新君主如果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就

①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2页。马基雅维利将新君主国进一步分为混合君主国和全新的君主国。前者是君主在原有的统治范围外扩张自己的领土，新占领的土地与属民和原有的统治并存。混合君主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其扩张行动给新获取的属民带来的损害。不过，君主原有的领土和统治能够为其扩张提供支持与缓冲。在全新的君主国中，新君主面临的境遇则要险峻得多。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全新的君主国。

② 同上书，第59页。

不能听从古典作家的教导,而需要在思想理论层面经历一个启蒙的过程。也基于此,新君主之“匮乏”,或者说新君主之“新”,不仅体现为他作为一位奠基者和革新者而失去了既定的统治和制度的支持,还体现为其隔绝了与传统的政治理论和宗教思想的联系。在实践层面,由于缺乏既定的统治和制度的支持,新君主必须从“无”中创生政治秩序和权威;在理论层面,传统的思想家无法在“如何维持统治”的问题上为新君主提供有效的支持。这种双重的匮乏使得新君主“孤零零地站在一个空寂的空间里”^①。

一如沃林所言,在马基雅维利笔下的由不知休止的野心和骄傲搅动的世界里,不安分的政治行动者要么被野心搅扰,要么被无聊挑动。所有这些因素压缩了政治空间,创造出一个稠密的、过于拥挤的政治世界。新君主置身其中的这片政治空间,留给政治野心家的唯一路线便是:强行将那些业已占领区域上的人驱逐出去。^② 面对双重的匮乏,新的制度和秩序只能由那些被释放了野心的政治行动者凭借自己的军事德行和获取欲望建立起来。也基于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最为稳定、最为荣耀的是依靠自己的武力和德行获取国家。^③ 这意味着新君主的统治必须以对武装力量的获取为前提条件。马基雅维利以其惯常的夸张口吻强调了武装和军事活动的重要性:

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这种专业,而使你赢得一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精通这门专业。^④

马基雅维利对于武装和军事德行的强调不仅是为了应对外部竞争对手的威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杨君游、柯锦华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② Wolin, Sheldon S., *Political and Vision—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95.

③ 在《君主论》中,“国家”(la Stato)常作为被获取的对象出现。在马基雅维利这里,国家尚不能等同于中立性的、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君主获取、维持自己的国家意指获得和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统治状态。参见 Hexter, J. H., *The Vision of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More, Machiavelli and Seyssel*,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④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56页。

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人民的重视密切相关。站在现代社会的门槛上，马基雅维利看到，人民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最有力量的群体，新君主对于国家的统治和维持有赖于这一群体的支持。^① 基于一种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取向，马基雅维利强调人民这一群体的重要性；也同样基于经验观察，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对人民抱有过高的期待。在他看来，“不轻易信任”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当人们尚未在新君主及其新制度的统治中取得牢靠的经验时，他们就只能算作半心半意的支持者。同时，人民的性情是易变的，新君主或许可以在某件事情上说服民众，但是要让民众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是十分困难的。在这一问题上，吉罗纳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修士的失败遭遇不可能不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考产生冲击。对于这位凭借宗教获得民众支持，最终又被教会斥为异端并处死的修士，马基雅维利总结出的教训是：萨沃纳罗拉在政治上遭遇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源自武装力量的缺乏。“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② 在《君主论》中，被奉为典范的新君主大多崛起于行伍之中。新君主的统治必须以对武装力量的获取为前提条件，从而确保在人民失去对新制度的信仰时能够依靠武力维持统治。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德行是获得民众敬畏的根本，一如鲁莽大胆的年轻人更容易获得命运女神的青睐。马基雅维利强调，新君主除了要避免人民的憎恨，获取充分的武力后盾之外，还需要更为主动地“从事伟大的事业和做出卓越的范例”，“赢得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从而获取臣民的尊敬，避免遭受轻蔑。投身于军事活动，甚至不避讳为这种活动所需的残酷行径，这是为君主带来荣耀和尊敬的至关重要的途径。^③

与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君主对于贵族群体的警惕乃至敌

① 马基雅维利曾明言：“如果说，在罗马帝国时代，满足军人比满足人民更有必要；那么现在所有的君主，除了土耳其皇帝和苏丹之外，满足人民倒是比满足军人更有必要，因为现在人民比军人更有力量了。”〔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22页。

③ 同上书，第66页。在《君主论》中，西班牙国王费迪南(Ferdinando II di Aragona)和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都是利用残酷行径获取军事胜利和维持统治的典型。马基雅维利评价博尔贾时提到，他让雷米罗承担推行新制度的仇恨并在事后诛杀他的残酷景象使得人民感到痛快和满意的同时，又生出了惊讶和恐惧。需要指出的是，马基雅维利对于残酷的赞同并不意味着他在宣扬暴君统治。正如先前所论述的那样，君主的残酷手段不能用于对人民的财产、名誉和生命的任意剥夺。

视。在《君主论》著名的讨论两种脾性的段落中,马基雅维利指出贵族群体的特征是要统治和压迫人民。贵族这种不安分的支配欲一方面会招致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另一方面也会对新君主自身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马基雅维利将贵族分为两类:一类是胆怯而缺乏勇气、需要依赖君主的贵族;一类是野心勃勃、随时可能会取君主而代之的贵族。对于前一种不惧威胁的贵族,新君主只须给予光荣和爱护就可以。但是,对于后一类贵族,君主需要“把他们当做公开的敌人那样加以警惕”^①。正如先前所论述的那样,新君主推行新的制度时会伤害旧制度下得利的人。而指望通过给予新恩惠的方式让一位“大人物”忘却旧的伤害,这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马基雅维利在多处或明或暗地表示,对于那些有权势欲的贵族,有德行的新君主会寻找时机彻底消除这一威胁。^②事实上,就旺盛的支配欲这一特征而言,新君主更接近贵族,而非人民。不过,在一人统治的君主政体下,旺盛的支配欲反过来引发了这一群体内部的猜忌和敌对。为了维持权威和秩序,新君主必然要铲除其治下其他潜在的新君主。这种策略的确能够确保新君主的稳固统治,但它也加剧了君主国的一个困境:新君主难以找到一位具有同样德行的继承者。这一点在之后与共和政体的对比中会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置身于一个匮乏、孤寂且充满竞争的政治空间,传统政治理论的局限性被戏剧化地凸显出来。为了能为君主维持自己的统治提供有益的建议,马基雅维利认为“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情况(*verità effettuale della cosa*),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immaginazione*)”^③。这一视角的转变让马基雅维利看到了那些不受古典作家待见的政治观念所具有的实践价值。在马基雅维利那里,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思想视野的转换之间形成了共振。在这个由新的政治现象所构成的政治空间中,摒弃了“前见”的马基雅维利需要阐述一种以获取和德行为核心的新理论,从而给予像他一样孑然独立的新君主以有效的教导。

三、双线叙事:《君主论》中的新君主与世袭君主

马基雅维利对新君主的教导显然与其对世袭君主的教导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①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38—39页。

② 同上书,第27、33页。

③ 同上书,第59页。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以相当轻松的口吻论述了世袭君主统治的确定性和牢固性。关于世袭君主的集中讨论仅占据全书的一个章节，而且还是整书篇幅最短的章节之一。尽管《君主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新君主及其统治的维持，马基雅维利如此轻易地打发走世袭君主的做法还是让人颇感意外。结合《君主论》对于新君主的论述，我们或许可以推断，马基雅维利这里对于世袭君主国的敷衍可能是暂时性的。面对来自新君主的威胁，世袭君主国最终也不得不投身到积极获取的事业中。在第二章后，世袭君主并未从《君主论》中消失，而是构成了文本中的一条重要暗线。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世袭君主统治的根基主要在于臣民“自然而然的”支持。习俗和制度使得世袭君主国中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相对固定，臣民习惯于这种政治，世袭君主也无须推行可能危害臣民的新制度，这使得变革的记忆被模糊了。即使遭遇某种“异乎寻常的、格外强大的力量”的颠覆，世袭君主也能利用臣民的支持和爱戴而光复旧位。但是，世袭君主国所呈现出来的确定性和守成性特征很快被打破。在紧随其后的章节中，马基雅维利明言：“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①从此开始，马基雅维利积极地就如何保有新获取的领土这一话题为君主建言献策。马基雅维利告诉新君主，君主国，尤其是那些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的君主国是比较容易保有的。当语言风俗相近时，征服者只须灭绝旧君主的血统，同时保留原来的法律制度，就能很容易地保有国家。在这里，习俗和制度给世袭君主提供的铠甲很容易被征服者利用。

同时，马基雅维利之所以认为世袭君主国的统治是简单而牢固的，是因为它能够获得人民自然而然的的支持。如前所述，马基雅维利在承认人民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对这一群体抱有过高的期待。人民的性情是易变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②。如果说人民的支持和爱戴并不稳定的话，那么世袭君主的统治基础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他人的意志之上，而非君主自己的意志之上，这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是非常危险的。此外，一个不事扩张和战争的君主不仅难以获得人民的长久好感，而且还极易招致人民的蔑视，而这是侵蚀君主统治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一个君主如果

①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22页。

不懂军事,除了已经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既不能获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够信赖他们。”^①马基雅维利在论述世袭君主的统治时没有提及人民性情的易变,以及军事活动的重要意义,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沉默多少显得有些可疑。从一定意义上说,世袭君主国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出现在《君主论》的文本中:它们是新君主扩张自己的领土、获得伟大声名和军事荣耀的“猎物”。马基雅维利在安抚世袭君主时说,只有那种异乎寻常的、格外强大的力量才可能推翻其统治。而在《君主论》中,作为新君主榜样的那些人,恰恰就拥有这种“格外强大”的征服力量。^②

马基雅维利对于世袭君主的教导颇有些请君入瓮的意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进一步对照他的喜剧《曼陀罗》来理解。马基雅维利留存下来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政治、军事和历史等沉重题材的严肃著作;另一类是意在逗乐、消遣和排解苦闷的轻佻小品与戏剧。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严肃的题材与轻佻的话题之间存在诸多共性。在他那里,恋人对于爱情的渴望常常与政治家对于权力统治的追求相呼应。^③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是一部借助骗局赢得恋人的爱情喜剧。故事发生在1504年的佛罗伦萨。主角卡利马科是一位在法国长大的佛罗伦萨青年商人。他听闻一位名叫卢克蕾加的佛罗伦萨女子拥有绝世美貌,遂为之倾倒。卢克蕾加是一名善良正派且聪明谨慎的已婚妇女。卢克蕾加的丈夫尼治老爷是一位富有而迂腐的博士。二者一直苦于膝下无子。为了得到卢克蕾加,卡利马科在谋士李古潦的帮助下,装作从巴黎来的名医,利用尼治和卢克蕾加膝下无子的心结,炮制了一种用曼陀罗草做成的药水。他们告知尼治,服用这个药水能够帮助卢克蕾加受孕。但是,第一个和卢克蕾加同房的男人会在八天内死去。

①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57页。

② 例如,在马基雅维利关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案例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君主的伟大和声誉主要体现在他在征服事业中取得的成功,以及其在军事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德行。同上书,第88—89页。

③ 例如,在《克莉齐娅》的一幕独白中,马基雅维利借角色之口探讨了恋爱者和士兵之间的相似性:不论是军官,还是女人,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士兵或恋人是小伙子;士兵排除万难,宁死也要制胜敌人,正如恋爱者冒着一切恶劣的情况追求爱人而至死不休;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爱情中,同样都需要保密、忠诚和勇气,也同样面临危险和某种结局——“士兵死在壕沟,恋爱者死于绝望”。参见[意]马基雅维利:《克莉齐娅》,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4卷,徐卫翔、刘儒庭、胡维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138页。

因此，尼洽必须先找一个替死鬼与卢克蕾加同房。卡利马科凭借对福音书和拉丁语的熟知赢得了尼洽老爷的信任，并顺利将后者引入骗局。在故事的高潮，卡利马科乔装成路人，并设计被李古潦和尼洽“选中”，最终如愿和卢克蕾加同房。^①

《曼陀罗》中讲述的爱情骗局和《君主论》中对世袭君主的“诱捕”，可以视作轻佻作品和严肃题材之间的互文。年老的尼洽类似一位世袭君主，他对足不出户的卢克蕾加看似稳固的掌控一如封闭的世袭君主对人民的牢固统治。马基雅维利对世袭君主的安抚式宽慰，正如李古潦对尼洽的许诺（卡利马科的“药方”会为他带来子嗣）。《曼陀罗》的骗局最终能否实现依赖于他们是否能够说服卢克蕾加接受这个“药方”。李古潦利用了卢克蕾加的虔诚，让她的母亲和她的忏悔神父说服了她。不过，卢克蕾加并非如尼洽那般愚蠢。在知道了真相后，卢克蕾加透露出对丈夫的轻蔑以及对卡利马科的接受。她不再是受人蒙骗的玩偶，转而以女主人的姿态将这种复杂的关系安排得井井有条。卢克蕾加的角色与《君主论》中的人民遥相呼应。后者轻视那些军事上无能的君主，尊敬那些获取伟大声名和军事荣耀的君主，一如前者蔑视迂腐无能的尼洽，青睐鲁莽大胆的卡利马科。马基雅维利提供给新君主的教导，是守成型世袭君主的统治软肋，亦是这场“骗局”得以成功的关键。

将世袭君主视作《君主论》中的一条暗线可以发现，轻信习俗和旧制、将统治完全寄托于臣民的支持的世袭君主最终会沦落为新君主的猎物。这并非减损习俗、制度和民众支持的重要性，只不过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些维持统治的因素最终源自君主本人的德行（尤其是在军事扩张上的德行）和意志。就此而言，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两条线索表明，三种类型的君主国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获取对于任何一类君主而言都是必要的。所有的世袭君主国在其初始阶段都是一个新君主国，它的建立同样经历了奠基和革新的过程，只不过家族的长久统治淹没了民众对于革新的记忆。世袭君主国远不像马基雅维利表面所说的那样安全和稳固，它要么走上混合君主国的道路，要么就很可能成为新君主猎取和征服的对象。即使不是通过政治革新的方式，世袭君主国也可以凭借伟大的事业和卓越的范例而实现与新君主相媲美的成就。被马基雅维利奉为当代榜样的西班牙君主斐

① [意]马基雅维利：《曼陀罗》，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4卷，徐卫翔、刘儒庭、胡维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61—124页。

迪南同样是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君权,但是他对贵族的驾驭、对宗教的残酷运用,以及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和西班牙的统一,使他“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为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王,因此他几乎可以称作一位新君主”^①。相应地,世袭君主国通过获取和征服而变得与新君主国无异,当新君主审慎地遵守马基雅维利的教导时,他就能像世袭君主一样稳固地保有他的地位,甚至获得比世袭君主更加安全和稳固的统治。^②由此,世袭君主与新君主之间的差异逐渐变得模糊了。在《君主论》所设定的政治空间内,世袭君主为了自己的生存也需要像新君主那样行事。

四、罗马:共和国中的“新君主”

长久以来,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呈现的绝对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双重面向构成了其政治理论中的谜题。强调马基雅维利共和主义面向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也都面临困难。将《君主论》从马基雅维利共和理论中隔绝开来的做法可能会忽略前者的理论意涵;而试图勾连马基雅维利的双重面向的解释则难以平衡“授恶学说”和共和主义的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③波考克(J. G. A. Pocock)敏锐地察觉到了马基雅维利共和理论中蕴含的军事热情和扩张欲望。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的一个重要对策是“公民生活的军事化”。这种对“军事德行”的强调使得马基雅维利笔下的罗马对内能够保持一种“平等”(平等地关注公共利益),对外能够通过征服行为确保安全并获得荣耀。^④不过,波考克整体的解释框架仍旧倾向于将马基雅维利放置在传统共和主义和公民人文主义的承续脉络中,这使他没能更加系统地分析获取和扩张在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中的贯穿性作用。事实上,从获取和扩张的视角切入可以发现,马基雅维利对于新君主的劝谏不仅适用于世袭君主,还同样适用于共和国。在这种解读下,新君

①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88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

③ 例如,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就质疑“狐狸的狡诈”会威胁共和主义的价值。参见Pitkin, Hanna Fenichel, *Fortune Is a Wo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④ [英]J. G. A. 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冯克利、傅乾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主超越了作为具体的人格化统治者的存在，抽象为一种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治方式。

马基雅维利对于获取和扩张问题的重视与主张是一贯的。这不仅是新君主和世袭君主必须从事的事业，也是君主国和共和国都应当采取的策略。正如君主国为了维持统治而必须走上获取的道路一样，共和国为了维系秩序和自由也需要走上扩张的道路。从一定程度上说，共和统治相较于君主统治的制度优势就体现为前者在军事扩张上更容易取得“伟大的成就”。在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中，强调君主统治和共和统治之间一致性的段落并不鲜见。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常常有意模糊共和国和君主国的区别，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马基雅维利对执政官的称呼上。例如，马基雅维利在讨论罗马王制时代的结束时评论道，罗马人在废除了王的称号后立即创立了两位执政官来取代先前的王，“结果从罗马驱逐的是王的称号而非王的权力”^①。尽管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执政官明显区别于由家族继承产生的王，前者所具有的权力及其在城邦中扮演的角色仍旧十分类似于王。在讨论共和国和君主国的创建者时，马基雅维利称执政官为“那些因运气或者德行而成为共和国的君主的人”。类似地，在讨论罗马的宗教的章节中，马基雅维利告诫称：“一个共和国或王国的君主必须维持他们信守的那个宗教的基础。”甚至在讨论共和国在扩张问题上相较于君主国的优越性时，马基雅维利颇为诙谐地评论道，共和国通过选举能够产生“无数极具德行的君主”。此外，在讨论如何应对有野心的公民试图通过私人途径获取名声和专制问题时，马基雅维利给出的一个提议就是选举出发挥着“王权性质的权力”的独裁官。^②

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君主国和共和国的互文不仅仅体现为用语上的有意混淆。更为重要的是，共和国同样需要在对外扩张中维持秩序和自由。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将罗马和斯巴达视作两种共和国的模式。斯巴达代表的是

① [意]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薛军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152页。

② 同上书，第172、185、209、536页。参见 Niccolò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Harvey Mansfield & Nathan Tarcov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马基雅维利暗示，执政官扮演着王政时代罗马国王的角色。他列举的一些执政官，如曼利乌斯(Manlius)，同样善于运用残酷。参见傅乾：《马基雅维利的 virtue》，见韩潮主编：《谁是马基雅维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117页。

“以维持自身为目的”的贵族共和国,这种共和国不事扩张,能够在封闭的领土内维持自由和安宁;罗马代表的是“想建立一个帝国”的平民共和国,能够充分利用贵族的野心和平民的力量在对外扩张的事业中获得荣耀和伟大。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和斯巴达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新君主和世袭君主之区分的共和版本。一如在讨论世袭君主国采取的“绥靖”策略时,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完贵族共和国的优势后笔锋一转,随即否认了守成型共和国所采取的“中间道路”的可能性。“由于人类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之中,不能保持静止不动,它们必然地要么上升要么下降;许多事情是理性没有促使你去做,而必然性却促使你去做。”^① 对于一个不事扩张的共和国而言,即使它有幸没有被其他共和国征服,也往往因自己的野心或懒散而失去内部的自由和安宁。有鉴于此,马基雅维利总结道:“在组建共和国时,就必须考虑其中最显要的方面,把共和国组建得即使必然性促使其扩张,它也能够保住它已经占有的东西。”^② 在获取和扩张的问题上,马基雅维利将给予新君主的劝谏也几乎都传授给了共和国。^③ 马基雅维利宣称:“君主们在起家发迹时必须做的事情,共和国也必须做,直到它们变得强大,而且单靠武力就足够了。”^④ 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毫不讳言地建议共和国学习罗马在结交盟友、殖民扩张中所采取的暴力和欺诈策略,认为共和国要懂得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假借慷慨大度之名才能顺利实施统治之事。马基雅维利指出,在扩张型共和制度下,罗马人在对外扩张中表现出“罕见且极端的能力”^⑤,并最终摧毁了意大利境内其他同样富有德行的共和国。充分释放了扩张热情、展现出卓越德行的罗马,是共和国中的“新君主”。

获取和扩张是君主国和共和国都必须采取的策略,不过,相较于君主国,共和国在扩张事业中更具优势。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称,一个君主国若想在对外征服中获得伟大成就,就必须有两个有德行的君主相继接任。马其顿的

① [意]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薛军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166页。

② 同上。

③ 在《李维史论》第2卷第1章,马基雅维利在论述罗马人获取领土的方法时明言:“本来要指出罗马人民在进入别人的领土时所采取的方法的,只是在我的著作《君主论》中,我已经详细谈及此。”同上书,第322页。

④ [意]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薛军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363页。

⑤ 同上书,第321、324、328页。

腓力(Philip II of Macedon)和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就是典型案例。然而,获取和扩张所要求的德行总是受制于君主国的继承困境。由于难以保证每位继承的君主都具有同等的德行,君主国尽管有可能在扩张和征服中取得与共和国相媲美的成就,但维持这一扩张成就上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马基雅维利称:“在一个杰出的君主死后,一个软弱的君主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在一个软弱的君主死后再有一个软弱的君主,是不可能维持任何王国的。”^① 共和国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君主制的继承困境。马基雅维利指出,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中,人们可以看到有德行的执政官和军事将领能够持续不断地涌现出来,这是罗马能够在对外扩张中获得伟大成就的基础。只有在共和国中,新君主所开创的事业才能得到继承和发扬。奠基和革新的事业需要由一人独自担当,但是在制度和秩序的维护上,共和制度更具优势。

在扩张问题上,共和国相较于君主国的优势是制度性的。在共和国中,执政官并非基于血统,而是通过自由选举获得最高权力。自由选举的方式规避了继承制的不确定性,它使得罗马总能选出“极其杰出的人”来担任执政官。^② 进一步说,共和国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军事将领,在于其能够更好地容纳、利用贵族和人民的两种脾性。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提到,贵族和人民的两种脾性在城市中可能产生三种结果:君主权(principato)、自主权(libertà)、无政府状态(licenzia)。^③ 其中,君主政体要么由人民建立,要么由贵族建立,它反映的是两种脾性的对立结果。正如先前所分析的那样,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民的脾性和欲望更加公正,贵族的权势欲往往会威胁君主的统治权威和秩序。有鉴于此,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警惕甚至铲除那些同样具有权势欲的贵族,这客观上加剧了君主国面临的继承困境。与君主政体不同,共和政体为民众和贵族的共存提供了可能性。以罗马为原型的扩张型共和国在充分调动贵族德行和任用军事将领的同时,能够将人民纳入政治和扩张的事业中来。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称,贵族和平民的冲突让罗马深受骚乱和争端的困扰,但是如果罗马想

① [意]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薛军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207页。

② 同上书,第209页。

③ [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37页。

要长期保持其自由,获得荣耀,就不能像威尼斯或斯巴达那样“安宁”。威尼斯不利用平民打仗,斯巴达不向外人打开通路,而罗马把这两件事都做了。^①在对外扩张的事业中,共和国疏导了贵族的野心。同时,基于对民众军事力量的依赖,共和国又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其政治影响力,从而节制了贵族的支配欲,并由此实现了二者斗而不破的平衡关系。

从获取和扩张的角度切入可以发现,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概念具有一层更加普遍的意涵。新君主不能完全等同于作为理想类型的人格化统治者,他扮演着开端启新的角色,冲击了陈旧的城市共和国制度,涤荡了古典和基督教的政治理论。这一概念对政治野心的承认、对获取和扩张的强调,代表了一种新的统治方式,这也是所有政治行动者都应当遵循的策略。基于此,“新君主”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串联成一个连续性的议程。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新君主的这一解读并未抹杀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之间的差异。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共和政体,尤其是以罗马为原型的扩张型共和政体,对于贵族和平民两种脾性的包容使其克服了君主国的继承困境。新君主的事业最终要在共和制度中才能得到最为长久的维系。以罗马为原型的共和制度能够更好地实现扩张的需要。

五、结 语

作为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好友,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在阅读完《李维史论》后颇带指责意味地感慨道,作者在书中总是发表关于极端和暴力方式的言论。^②的确,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理论明显区别于稍早的公民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利对于罗马共和政体的赞美并未停留在共同体内部的自由、自治和政治参与等传统共和价值上,让他更加心向往之的似乎是罗马在对外扩张和军事霸权中获得的至高荣耀。新君主所代表的对野心的释放、对扩张的鼓动同样是共和国应当采取的统治方式。正是基于君主国和共和国在获取与扩张事业上的

① [意]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薛军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162—164页。

② Guicciardini, Francesco, “Considerations of the Discourse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in *The Sweetness of Power—Machiavelli’s Discourses and Guicciardini’s Considerations*, James B. Atkinson & David Sices (trans.),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一致性，马基雅维利的共和理论沾染了《君主论》中备受争议的“授恶学说”。

马基雅维利对于获取和扩张的热情，与文艺复兴晚期佛罗伦萨乃至更广泛的意大利所处的内外交困的窘境密切相关。在意大利境内，以佛罗伦萨为代表的城市共和国遭遇到以米兰为代表的公国的猛烈冲击。在持续几个世纪的动乱中，佛罗伦萨始终受困于持续的派系斗争、羸弱的军事实力、繁琐拖沓的议事制度。^①同时，意大利各城市长久地受到来自欧洲大陆君主国的威胁。面对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的侵扰，马基雅维利试图为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寻求一条出路。马基雅维利在为佛罗伦萨服务的十二年里已然察觉到，古老的城市共和国疲态尽显，领土国家逐渐崛起。文艺复兴末期的政治历史变迁与马基雅维利思想视野的转换之间形成了共振。将马基雅维利的两部作品视作一个连续性的关于获取和扩张的议程，这的确凸显了马基雅维利共和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考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这一理解并不试图忽略或掩盖马基雅维利对于城邦自由、政治参与以及公民美德这些传统共和价值的认同。只是在领土国家时代，共和价值的存续不能寄托在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中，而是需要被安置在一个充分释放了扩张热情的共和国中。^②其次，从君主国到共和国的过渡并非一劳永逸。在一个扩张型共和国中，马基雅维利需要妥善地处理民众参与、政治冲突以及帝国治理等问题，唯有如此，脆弱的共和价值才能在“新的大陆”上得以维持。最后，马基雅维利对于获取和扩张的限度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罗马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扩张与自由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张力关系。在共和国发展初期，扩张和自由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伴相生、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随着扩张进程的推进，伴随对外扩张而来的土地法争端、治权的延期以及东方专制国家风俗习惯的侵入等因素最终又葬送了共和国的自由。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指出，罗马在刚刚完成统一意大利半岛事业的时候，“达到它的那种伟大之巅峰”^③。

① [意]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2卷，王永忠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

② Ardito, Alissa M., *Machiavelli and the Modern State: The Prince, the Discourses on Livy, and the Extended Territorial Republ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意]埃蕾娜·法萨诺·瓜里尼：《马基雅维利与意大利各共和国的危机》，见[德]吉塞拉·波克、[英]昆廷·斯金纳、[意]莫里奇奥·韦罗里编：《马基雅维利与共和主义》，阎克文、都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③ [意]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第1卷，薛军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209页。

封面设计：武守友



北大政治学评论 官方微信



商务印书馆官方微信

<https://www.cp.com.cn>

ISBN 978-7-100-24411-4



9 787100 244114 >

定价：118.00 元